

DANGAN

重庆市 档案馆四十年

— 重庆市档案馆/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馆区鸟瞰



档案库房及办
公裙楼



馆区一角



国家一级馆证书和授牌



开馆纪念照

曾三同志视察重庆市档案馆留影
(1963年3月6日。左起第五人是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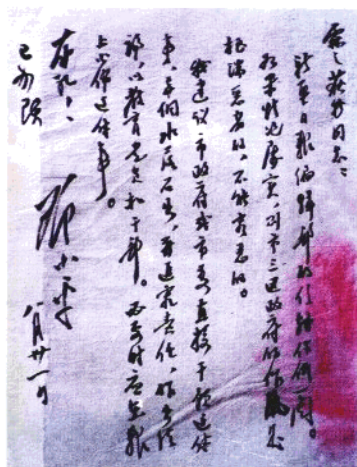


原永川分馆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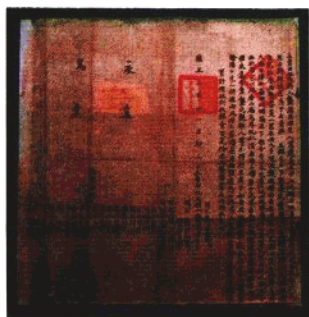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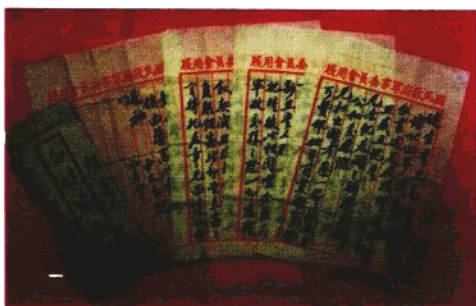


原化龙桥馆区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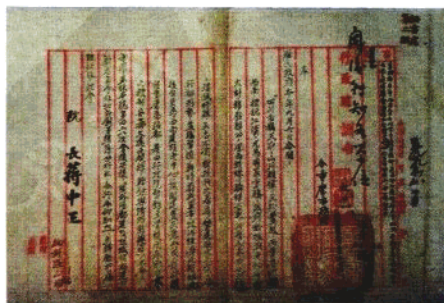
邓小平亲笔信



蒋介石亲笔信



清雍正时期地契



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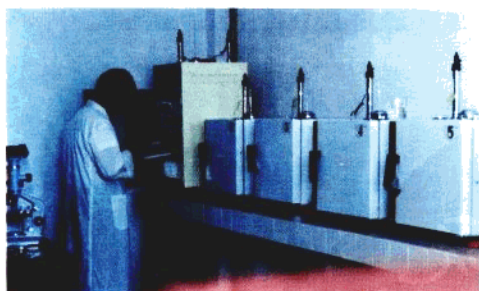
库房内景



部分编研成果



消毒杀虫准备



防虫治虫试验室

前 言

为纪念重庆市档案馆建馆 40 周年,我们编撰了《重庆市档案馆四十年》。

《重庆市档案馆四十年》的编撰宗旨,是通过这本书,记录重庆市档案馆经历的 40 年历程,总结重庆市档案馆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讴歌重庆市档案馆几代档案人艰苦创业、甘于奉献的精神,展望重庆市档案馆在 21 世纪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蓝图。

《重庆市档案馆四十年》的编撰原则,一是以实事求是为基本指针,重史料、重史实,既是庆典之贺,又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要充分利用史料,要有一定的学术含量;二是注重附录的使用,使其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相互佐证;三是不仅面向档案界,也要面向社会,如第二章“馆藏”、附录 6“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目录一览表”、附录 9“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编汇成果一览表”、附录 10“重庆市档案馆论著一览表”、附录 11“《档案史料与研究》史料目录”、附录 12“重庆市档案馆科研成果一览表”,具有很强的现实的社会查考功能;四是在写作上以叙为主、叙论结合,既要严谨求实,又力求通俗流畅。

《重庆市档案馆四十年》的编撰体例,采用了综述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综述部分相当于全书的总纲或总论。

实际上是一部重庆市档案馆简史。它按照通史编年的要求,分阶段地对重庆市档案馆四十年历史作了全方位的论述。为增加其可信度,文内所引史实均加以注释并标明出处。专题部分则从几个特定的方面,分别介绍和评述重庆市档案馆各项档案业务工作的开展情形和发展概况。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注意了充分发挥这种编撰体例综述和专题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优点。同时,为发挥各专题撰写人员的专长和主观能动性,对各专题的写作体例和特点未作统一规定和限制。对于这种体例综述和专题难以避免会有重复的问题,我们对综述和各专题都必须提到的事项,尽量在详略、角度、深度上作了不同的处理。

《重庆市档案馆四十年》由黄立人主编,郑永明、唐润明任副主编。陆大钺主审。其中第一章由黄立人撰写,第二章、第五章由唐润明撰写,第三章由胡懿撰写,第四章由徐建明撰写,第六章由郑永明撰写,第七章由陆大钺撰写,第八章由袁兵撰写。此外,附录1至5由冯丽霞编纂,附录8由徐建明、黄爱华撰写。

全书由黄立人策划、统稿。陆大钺审稿。

为一个档案馆写史,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由于写作的时间稍嫌仓促,加之我们的认识水平的局限,书中一些观点尚不够成熟,可能存在一些疏漏和错误,期待档案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著 者

1999年10月于重庆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综述	(1)
一、筹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59——1966 年)	(1)
二、“十年内乱”停滞时期(1966——1976 年)	(24)
三、恢复、整顿和开创新局面时期(1976——1986 年)	(36)
四、加快发展、全面提高时期(1986——1999 年)	(60)
第二章 馆藏	(122)
一、馆藏组成概况	(122)
二、馆藏结构及其主要内容	(131)
第三章 接收、整理和保管	(182)
一、基础工作的奠定	(182)
二、“文革”中基础工作的停滞与倒退	(188)
三、基础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193)
四、新时期基础工作的勃兴	(199)
第四章 利用	(209)
第五章 编研	(249)
一、编研工作概述	(251)
二、编研工作的基本作法	(266)
第六章 科研和现代化管理	(311)
一、档案保护技术研究	(311)

二、档案现代化管理	(328)
第七章 21 世纪的展望	(341)
一、加速档案馆社会化进程	(342)
二、加速档案馆现代化进程	(348)
三、以人为本,更加注重队伍建设	(353)
第八章 重庆市档案馆大事记	(358)
附录 1:重庆市档案馆址变迁状况表	(112)
附录 2:重庆市档案馆内设机构沿革	(114)
附录 3:重庆市档案馆历任领导简况	(115)
附录 4:重庆市档案馆职工状况	(118)
附录 5:重庆市档案馆历年财政拨款状况	(120)
附录 6: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一览表	(152)
附录 7:重庆市档案馆历年利用情况统计表	(222)
附录 8:档案利用 30 例	(224)
附录 9:重庆市档案馆档案编汇成果一览表 (1960——1999 年)	(273)
附录 10:重庆市档案馆论著一览表 (1985——1999 年)	(284)
附录 11:《档案史料与研究》史料目录	(301)
附录 12:重庆市档案馆科研项目一览	(336)

第一章 综述

一、筹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59——1966)

新中国的诞生,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档案事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中,中国经历了巩固人民政权、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始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化,新中国档案事业也走过了它极其重要的一段历程:随着档案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中央和省级机关普遍设立了档案事业管理机构,确立了我国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全国性的业务指导工作开始发挥作用;档案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和全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干部;中央和国家一系列重要文件和会议,规定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个历史阶段档案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到1959年,中国档案事业出现了以地方档案馆蓬勃兴起为标志的发展高潮。

重庆市档案馆的筹建和开馆就是在这个高潮中开始和完成的。除了上述大背景外,市馆的筹建和开馆也是重庆地区档案工作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重庆市档案工作面临一些紧迫的问题:

1. 大批历史档案的管理和抢救亟待解决。据摸底调查,共有旧政权

时期档案 100 余万卷或散存于 70 多个代管单位,或下落不明,^① 这些代管单位多数没有设专人管理这些档案,档案流失、虫蛀、霉烂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事业单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改造后的新单位割断了与旧单位的历史关系,变化很大,其代管的旧单位档案许多处于代而不管的状态。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没有明确的代管单位散存于社会上的档案,处于更为危险的流失和毁坏状态。2. 大批撤销机关档案的管理亟待完善。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当时的大区、市和市属机关调整频繁,变化很大,撤销机关档案的管理是一个重要问题。1954 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和政府机构后,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西南大区档案管理处,临时集中保管西南大区一级的档案,但其中与重庆市密切相关的重庆市一级的档案有待移交市管理。除此而外,据当时摸底调查,尚有本市撤销机关约 15 至 20 万卷档案,由业务相近的代管单位代管。^② 这些代管单位与原撤销机构一般没有因袭和承属关系,对其代管的档案难于作有效的管理和长期保管。3.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兴起,文化建设的高潮也接踵而至,“重庆市各项建设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越来越需要多方面利用档案资料。分散的仅仅为机关工作服务的机关档案室,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③ 而那些分散在各代管单位和社会其他地方的历史档案,由于根本不具备提供利用服务的条件,更难于适应社会对这些档案的利用需要。

档案工作发展的自身需要和社会对利用档案需求的推动,把建立全市性的综合性档案馆的任务提到了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的议事日程。1958 年夏秋之交,国家档案局洛风副局长来渝检查、

① 《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工作情况及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意见》,1959 年 11 月 14 日。市馆全宗,1959.4 卷。

② 同上。

③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关于建立市档案馆的请示报告》,1959 年 1 月 10 日。市馆全宗,1959.3 卷。

指导档案工作,向市委有关领导谈到筹建重庆市档案馆的问题。四川省档案局的领导同志在多次来渝指导工作的过程中也提及此事。1959年1月10日,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向市委提出《关于建立市档案馆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在指出了立即“建立一个全市性的档案馆,作为全市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基地”的必要性后,提出了档案馆的基本任务是:1. 收集、整理、保管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档案、开国以来撤销机关档案和现行机关利用不多的档案,并广泛组织利用;2. 开展技术资料交流工作,成为全市技术资料情报交流中心;3. 系统地收集、保管各种内部书刊资料;4. 协助市委办公厅担负一部分档案业务的指导和档案干部的培训。该报告还根据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提出档案馆一经建立,应立即把“收集整理和利用旧政权档案、撤销机关档案”和“技术资料情报交流工作”两件工作开展起来。该报告还对市馆的隶属关系、干部配置、设施经费和筹建的具体步骤提出了意见。关于隶属关系,报告指出“市档案馆归市委办公厅领导,但它同时又是政府的一个文化事业单位”;关于干部配置,报告指出“由于这是一项新兴的事业”,需要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所配干部除政治条件外,还应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文化水平”。关于经费,报告指出“应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在科学研究或文教事业费项目下开支”。关于筹建步骤,报告提出建立市馆筹建小组;进行摸底调查;准备房子、干部,并采取“边收集、边整理、边利用、边建馆,由小到大的方针”。

这个请示报告是重庆市档案馆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第一个重要文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告发出之时间,比我国地方档案馆建设的法规性文件,即《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和《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1960年3月18日)的颁行早了一年多的时间。该报告贯彻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我国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档案工作的方针,它对档案馆性质的规定,虽然在文字表述上与两个“通则”有所差异,但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即档案馆是党委和

政府直属的文化事业机构。它对档案馆“基本任务”和“特别需要”“立即开展”的两项具体工作的规定；它提出的“边收集，边整理，边利用，边建馆”的建馆方针，对市馆的筹建和建馆初期的工作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1959年1月21日，中共重庆市委〔59〕25号文批转同意了市委办公厅的请示报告，标志着重庆市档案馆筹建工作的正式启动。3月初，抽调来的5名干部在市委办公厅的直接领导下开始筹建工作，他们是：李锡钧、王世忠、陈富志、谢守平、谈永芬。4月上旬确定以市中区解放西路222号（原西南工人日报社址）为重庆市档案馆馆址。5月20日成立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处，下设秘书组、业务组，并宣布对外办公。此后，各方面抽调的干部陆续到位，到1960年3月正式开馆，先后参与筹建工作的同志有24人，他们是：张述成、侯政治、李锡钧、孙炬、王世忠、陈富志、许玉琴、周定洁、李继芳、秦建民、秦知善、张顺英、关传义、谈永芬、谢守平、郭继良、曾德蓉、刘云才、简代和、肖德奎、刘文、严文碧、胡木、曹德林。这些同志经过多年革命和建设工作锻炼，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其中党员68%、团员32%），抽调之前“都是经过市委、市人委审查过的”。^①按照“所配干部除政治条件外，还应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文化水平”的要求，注意配备了具有较高或一定文化程度并熟悉文书、档案业务的干部。其中来自西南大区档案保管处，市委、市人委办公厅档案科及其他部门从事档案、文书工作或相关、相近工作的干部有16人，占全馆职工人数的半数以上。尤其难得的是，在这些人中还有3人经过新中国第一个高层次档案人才的摇篮——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培训。正是这些人形成了市馆建馆初期业务干部队伍的中坚。

1959年5月28日，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通知正式成立市馆

^① 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处：《1959年干部工作总结》，1960年1月3日。市馆全宗。1959.3卷。

筹备处,并宣布由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张述成同志来馆主持市馆筹建工作。8月8日,市委〔59〕363号文件通知:经四川省委批准,张述成同志任重庆市档案馆馆长。张述成同志1929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曾辗转上海、广东、四川、贵州、广西、重庆等地,从事过党的地下学生运动、军事工作、农民武装、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解放后先后在重庆市企业局、第一工业局、第二工业局、轻工业局担任领导职务,是一个久经革命斗争考验、有着坚强党性原则和丰富工作经验的党员领导干部。他曾先后就读武汉、上海的五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具有较高的学历和学识水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德才兼备、善于领导、勇于创新的好带头人,使重庆市档案馆的筹建和开馆以后的发展,有了一个重要的组织保证。

筹备处正式成立之前,被先抽调到位的同志对全市档案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经过4、5、6、7月近4个月的紧张工作,掌握了旧政权时期和建国以来撤销机关档案的基本情况:一是数量浩大;二是全宗繁多,其中旧政权档案就有533个全宗;三是情况复杂,保管地点分散,保管条件差,档案损毁严重,许多档案未经整理,处于零散状态。面临上述情况,根据市委提出的市馆基本任务和当前工作的需要,市馆筹备处一经成立,即拟订了《关于清理和整理旧政权时期档案的初步意见》,经市委办公厅批转执行。该意见认为从档案的安全出发,必须立即组织接收档案进馆;同时为了“使入馆的档案材料,在入馆后能迅速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提供利用”,必须“做好这些档案材料的入馆工作”。为此,该“意见”对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提出了基本原则:关于收集的范围,规定“包括旧政权时期重庆市所属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材料”。关于对接收进馆档案整理的要求,在“必须按照原来的全宗进行”的前提下,分三种情况执行:1. 由一个单位代管的“档案材料较完整的全宗”,由代管单位负责整理后收集进馆;2.

由几个单位分散代管的一个全宗的档案,由代管该全宗档案最多的单位召集各代管单位协商整理后收集进馆;3. 对于分散、不完整又一时难以明确归属全宗的重要的档案,“则不必整理”,经清点和编目造册后直接收集入馆。关于“需要整理档案”的确定,提出凡是“便于查找利用的全宗”,不再重新整理;原有基础有缺点,但“一般尚能利用”的全宗,可作“必要的加工调整”,一般也不重新整理;凡是“根本不能利用的全宗”和“零散文件”,则应进行整理,并提出了进行整理的具体要求和办法。这个“意见”是重庆市档案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业务规定性文件,事实证明,这个文件在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对市馆筹建和建馆初期收集、整理工作的顺利、快速的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7月17日,第一批档案接收进馆,到1960年,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处共接收旧政权档案230个全宗(占市馆1998年历史档案全宗数62%),212215卷(占市馆1998年历史档案卷数43.10%)。^①接收的历史档案的主体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重庆地方政权机关、党务机关、社会团体,中央财政、金融机关在渝机构和地方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学校、医院的档案。接收撤销机关档案55个全宗、27251卷;资料2万余册。^②在当时人员少、业务力量薄弱,各种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在短短8个月时间中能够将如此巨大数量的档案有序地接收进馆,是与市馆措施得当和艰苦努力分不开的。首先是规划设计得当,制订了《关于清理和整理旧政权时期档案的初步意见》;第二是注意学习借鉴了南京、河北、辽宁等地档案馆的先进经验,通过到这些单位的实地参观考察,对筹备期间的工作帮助很大;第三是馆领导和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和忘我工作;第四是依靠了代管单位的协作和配合。市委曾明确指示,旧政

^① 张述成:《重庆市档案馆建馆工作情况汇报》,1960年5月6日。市馆全宗。1960.1卷。

^② 同上。

权档案入馆前要先由代管单位“区分全宗、剔出不重要材料、修改标题、装订成卷,并编好一式三份案卷目录”,加上筹备处的协调和指导,多数代管单位的党、政领导都能积极配合。如电业局、商业局、邮局、工商联、水泥厂、毛纺厂等单位,组织了较多人力进行突击整理。^①

收集工作的启动,必然要引起档案工作其他环节的联动。整理工作方面,到1959年底,共整理档案14个全宗、49186卷。^②保管工作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1. 准备档案库房。存放档案的库房是原报社的印刷、排版、校对用的厂房,50年代初修建,为砖木结构,三楼一底,大通间,大开窗,屋面为坡屋顶、小青瓦,面积1460平方米。为使其达到存放档案的基本要求,市馆筹备处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安装和配置了避雷和消防设备,在窗户上刷上白漆以避免阳光直晒。2. 防治虫害。修建了高温杀虫室,对已发生虫害的档案进行高温消毒杀虫,到1959年底,共对3万余卷档案进行了消毒杀虫。^③还在库房内放置香草、精茶等药物以驱虫、防虫。3. 防潮防霉。在库房内安装了鼓风机、排风扇,与在库房内放置矽胶、氯化钙、生石灰相结合,以调节库房内的温湿度。4. 初步建立了库房管理制度,制订了《库房保管暂行办法》12条,对进出库房、档案的借阅、档案的安全、档案的技术保护等方面,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利用工作方面,努力贯彻当时中央提出的“进一步提高档案工作水平,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档案工作方针^④和市委提出的“边收集、边整理、边利用”的建馆方针,千方百计地开展利用工作。有些档案,如中国毛纺厂、中国火柴原

① 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处:《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工作情况及今冬明春工作安排的意見》,1959年11月14日。市馆全宗,1959.4卷。

② 《重庆市档案馆志》,第37页。

③ 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处:《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工作情况及今冬明春工作安排的意見》,1959年11月14日。市馆全宗,1959.4卷。

④ 曾三:《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交流会上的报告》,载《档案工作》,1959年第6期。

料公司的档案,在未进馆之前,筹备处的同志即开始协助利用者到代管单位查阅档案。对于刚接收进馆还未来得及开箱上架的档案,遇有利用者需要查阅,也尽可能予以满足。为了提高提供利用的水平,筹备处在全馆开展了“熟悉家底”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一些重要全宗的全宗介绍,以方便利用者。到1960年3月开馆前,提供利用300余人次,调阅档案5000余卷,^①利用档案的热潮在市馆筹建阶段就初显端倪了。这一阶段利用者主要是大专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利用档案的目的主要是编写革命史、近现代史和工商发展史。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为编写重庆现代革命史调阅档案867卷。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刘鸿生民族资本集团调阅档案148卷。^②值得注意的是,编研工作作为利用工作中的一种较高级的主动提供利用的形式,在筹建阶段就得到了积极的开展。1959年5月20日,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在《关于五至十二月份档案资料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应及时对去年11月开展档案资料利用运动以来收集编写的大量档案资料进行加工、整理,……拟出题目组织有关部门编写史料”,“并根据需要及时编写一些‘应时小吃’,或选择整理一些原始材料,主动提供利用”。在市委的推动下,市馆筹备处组织人力编辑并内部印发了《正义与愤怒的吼声》和《杨森勾结北洋军阀历史罪证》两个专题史料汇编。前者5000余字,内容是解放前夕,重庆青年学生在“四二一”事件中举行游行示威集会时使用的“拉拉词”,对研究中共地下党在重庆领导“反饥饿、反迫害、争温饱、争生存”群众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者选辑了6个文件、1万余字,内容是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写给杨森的几封信,反映了北伐战争时期杨森与北洋军阀

^① 张述成:《重庆市档案馆建馆工作情况汇报》,1960年5月6日。市馆全宗,1960.1卷。

^② 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处:《重庆市档案馆筹备工作情况及今冬明春工作安排的意見》,1959年11月14日。市馆全宗,1959.4卷。